



石地著

古代治国智慧

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大大小小数十个朝代，这些朝代或更迭交替，或同时并存。每个朝代，都有或长或短的生存历史，都有一套治国治民的做法。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China Publishing Group Corp.



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China Publishing Group Digital Media Co.,Ltd.

序 言

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大大小小数十个朝代，这些朝代或更迭交替，或同时并存。每个朝代，都有或长或短的生存历史，都有一套治国治民的做法。

老子曾说过：“治大国若烹小鲜。”同是“烹小鲜”，有的是色、香、味俱佳，令人百尝不厌；有的却是平平淡淡，令人浅尝辄止。何以有此差别？根本原因，乃操厨者技艺差别所致也。

同是“治大国”，有的是百业俱兴，仓廪丰实，货充物足，民乐其业；有的却是百业凋零，府若悬磬，饿莩遍地，哀鸿遍野。何以有此差别？重要原因，乃为政者治国谋略优劣所致也。

治国谋略，顾名思义，即与治理国家有关、对治理国家有益的谋略。然而，国家机器是复杂的，国家事务是繁多的，这就使治国谋略的内容呈现为一副色彩缤纷、内容丰富的生动画卷。

封建帝王是一国的首脑，其自身的明智与昏庸，对一个政权的兴衰存亡有直接影响。一些有头脑有眼光的帝王，在巩固自己统治方面确实动了不少脑筋。例如春秋时的晋文公，先用帮助周襄王重执朝政并辞功不受赏的行为，告诉本国百姓对上尽忠就是“义”。再用坚决兑现“只攻打原国三天”的许诺的行为，教育百姓要讲“信”。又用自身对“礼”的遵守，教育百姓要守“礼”。晋文公教民的谋略确有令人深思之处。再比如北魏时，孝文帝为推进拓跋族汉化进程，决意将首都从平城南迁到洛阳。但当时很多目光短浅的贵戚重臣都加以反对。孝文帝便用占卜、制造迁都舆论，再向近臣秘密交底以争取臣下的支持，又借南伐的名义实现了迁都计划。整个过程体现了孝文帝的聪明睿智。

帝王明智，然于国有益。如果帝王不那么明白，贤臣智者对他们进行开导劝谏自然又是保持国家安定的重要事情。在这方面，也有不少有效的策略。春秋时期，郑国的子孔掌握了国家大权。子孔制定盟书，要百官绝对服从自己。众人不愿服从，子孔便要将他们杀掉。这时子产站出来，向子孔讲明了这样做的危害，劝他把盟书烧掉，此为“理谏”。后来，子皮执掌国政，想把封邑交给不懂得治理的家臣掌管。子产又用“漂亮的绸缎不能交给不会做衣服的人去练手”的比喻，使子皮懂得了封邑比绸缎珍贵得多，不能轻易付人的道理，此为“喻谏”。战国时，庄子与赵惠文王论剑，其中却蕴含着极具说服力的道理，此为“寓谏”。西汉时，吕后欲诛杀功臣，郦商巧妙地将参与其谋的审食其说服，使他劝说吕后改弦更张，此为“借人谏”。此外，还有“归谬谏”、“智谏”、“反谏”、“讽谏”等等。每一种劝谏方式，都反映了谏者的智慧及语言艺术。

如何处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这也是治国的大事。在处理这些问题上，当政的君王臣子们也用了不少心计。春秋时，卫国大夫石碏为了国家的安宁，利用陈国的力量诛除了自己的儿子和祸国殃民的州吁。东晋时，谢安采用拖延的办法，巧妙地阻止了桓温篡位。南朝陈时，毛喜利用“欲擒故纵”的手段粉碎了武人韩子高的图谋不轨。北宋初，赵匡胤通过一顿宴席成功地将兵权集中在自己手中，即人们熟知的“杯酒释兵权”。元朝时，王著设计诛除奸相阿合马。明武宗时，杨一清巧妙地利用宦官之间的矛盾，诛杀了惑乱朝政的刘瑾。凡此种种，体现了谋略在处理国家重大政治事件中的作用。

如果说中央政权是国家的政治中枢，地方政权就是国家政治肌体的肢干。对地方的治理谋略同样是治国谋略的组成部分，在这方面的事例也很多。例如西汉时，赵广汉治理颍川，对地方豪强采用制造矛盾、利用矛盾将其分而化之、化而治之的策略，确保了一方的安定。东汉时鲍永在鲁郡利用祭祀孔子的机会，解除危害地方平安的地方武装。羊续任庐江太守，身穿便服，到民间做调查研究，掌握治理地方的第一手资料。南朝宋明帝时，王敬则利用人们对鬼神的迷信将暨阳县的劫匪一网打尽。

我国自古就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对少数民族采取正确的政策、适当的策略，是关系到国家政权安定的大事。在这方面同样有很多事例。最著名的是诸葛亮南征，七擒孟获之事。五代时，马希范在溪州立铜柱，利用当地少数民族习俗取信于民。明朝弘治年间，郭緼受命进入少数民族聚居的云南地区调解民族纠纷。郭緼在这个过程中表现的取信于民的诚、不畏艰险的勇、随机应变的智，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治国谋略的内容如此丰富，决定了其所牵涉的人才面的广泛。那些为治国出谋划策的人，不仅有明智的君王，还有大臣、武将、士人、地方长官等。

从本质上讲，封建时代的治国谋略，是为巩固封建统治者的统治地位服务的。有两个例子非常典型地反映出这种本质属性。战国时期，有一次秦襄王患病，百姓为他恢复健康而祀祷神灵。

秦襄王不但不感谢，反而对他们进行惩罚。秦襄王在解释为什么如此时说：“老百姓之所以为我所用，不是因为我爱他们，对他们有仁爱之心，而是因为我使用权势让他们服从我。如今他们因为我病而为我杀牛祈祷，说明我已经放弃了权势而与他们讲仁爱以收其心。如果真是这样，——一旦我对他们不爱了，他们就会不被我所用了。所以我要责罚他们以绝爱民之道。”这充分反映了统治者不欲使民爱而敬之，而是想让民畏而从之。这反映了统治者治国谋略的治民本质。西汉武帝时，欲立钩弋夫人的儿子弗陵为太子。当时弗陵年幼，其母正当年。汉武帝怕自己死后出现子幼母壮、母后于政的局面，便设谋将钩弋夫人杀害。汉武帝基于历史教训，立子而杀其母，完全是为了确保刘氏政权的安稳。

我们在揭露了统治者治国谋略的阶级实质后。并不是说这些谋略丝毫没有可肯定之处。相反，我们认为其中的许多谋略对于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治国讲究谋略，可使国家政权巩固，社会稳定。如十六国前秦时，王猛辅佐苻坚治国，采用擒贼擒王的策略，整顿吏治，打掉不服从中央命令的豪强贵戚。苻坚高兴地说：“我今天才体会到作帝王的尊严。”正是由于中央集权加强了，出现了“关陇清晏，百姓丰乐”的局面，自国都长安至于诸州，“夹道树槐柳，二十里——亭。四十里一骑，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晋书·苻坚载记》）。百姓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生活，自然要比动荡战乱下好得多。

治国讲究谋略，在某种情况下也使百姓得到实惠。例如东汉时的廉范治蜀。在廉范任蜀郡太守前，前任太守历来禁止百姓在夜间劳作，怕照明之火引起火灾。百姓为了生计，夜间偷着干活，结果火灾更多，廉范取消了禁令，但要求百姓干活同时储备灭火之水。结果既减少了火灾，又便利了人民生计。

治国讲究谋略，谋略需要智慧，这是我们历览古代治国谋略得出的一个启示。今天，我们的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的谋略与智慧下可能完全适用于现在。但今天要把我国建设得更加强大，使人民更加富裕，我们仍需要谋略与智慧，而且是全民族的谋略与智慧。

书名：古代治国智慧

目 录

第一章 谏官谏用谏官
裴咱巧计捕从史
宣宗树威立制
巧用间计除盗贼
张承业果断定大计
冯道以诗谏主
明宗忍痛诛太子
孟昶立威恤民
李从珂鼓励进谏
铜柱勒铭定溪州
明判帝位化干戈
郭威起兵代后汉
吉顼复唐
智取商密

第二章 赛马谈兵，齐威王拜师
纵论削藩之策
瘫子皇帝治国有方
周世宗改革兵制
景翠一举三得
料敌如神，兵灭南燕
檀祗智退盗寇
自断退路败姚泓
安颉一战挽狂澜
王朴纵论《开边策》
周世宗改革官制
杨公则治军
冯道根守阜陵
杨侃计出解城围
降仁果秦王论战
赵普献计安天下
杯酒释兵权

第三章 范仲淹安边有方
借古喻今论新法
王安石变法图强
计除奸相阿合马
李孟计定宗庙
朱元璋复学诲将

仁宗施仁政
排众议赵王获救
裴行俭平叛兵不血刃
李光弼以少胜多坚守太原
不拘小节，志存高远
李嗣源因乱即帝位
斥佞臣太后保幼主
杨业巧计护民内迁

第四章 赈灾民不待皇命
夺门之变巧用计
李贤智谏明英宗
大夏计除弊政
刘大夏改制征饷粮
巧用征兆防火
张永计诛阉党
单骑人险解仇怨
杨廷和设计除佞
计杀文龙
高拱设计抚土官

正文

第一章 谏官谏用谏官

谏官是皇帝制度的产物，是专为劝谏皇帝而设置的。

谏官是朝廷政治的一角镜子，谏官所谏之内容，必是朝廷有缺陷的地方。

比如，谏官要求减轻赋税，则说明国家赋税很重；谏官劝皇帝远离女色，则说明皇帝终日混于后宫脂粉，荒废朝政。以此类推，谏官要求重用谏官，则说明谏官已被皇帝视为可有可无了。

唐朝中后期，谏官不再受重视。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元稹被宪宗任命为左拾遗，元稹就谏官的任职问题上书皇帝，他认为：“过去，太宗任命王邦与魏征为谏官，自己无论宴饮游观，还是寝息就餐，没有一时不让他们跟随在身边，还命令三品以上官员入朝计议重大政务的时候，一定要派遣一位谏官跟随，以便检验各种议论的优劣，所以当时天下政治修明。现在的谏官，首先不能得到圣上的召见，其次不能参究当前的政治措施，只是跻身于朝班的行列之中，按时上朝拜见圣上罢了，谏官不能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希望陛下经常在延英殿召见谏官时，让他们把意见都讲出来，怎么能够将他们安置在谏官的职位上又对他们弃置不顾，并且疏远贱视呢！”唐宣宗听后，似有愧意。

不久，元稹再次上疏，他认为：“在政治修明与祸乱危亡的初期，肯定是有萌芽和迹象的。开通直言进谏的道路，拓广接受意见的范围，这是政治修明的萌芽。喜欢阿谀逢迎，被自己亲幸的人蒙蔽，这是祸乱危亡的迹象。自古以来，在君主继位的初期，肯定会有敢于直言进谏的人士，从而奖赏他们，君子便愿意奉行他们的理想，小人也就不敢做奸邪之事了。如果能做到这些，那么上下之志相通，幽通辽远之情畅达，即使不打算政治修明，能够办得到吗？如果君主抵制直言上谏的人士，从而惩罚他们，君子便会藏身隐退，缄口不言，但求明哲保身，小人便会曲意迎合，从而窃居君子的地位了。像这个样子，要办的事情就是近在十步之内，也完全有可能做出欺上罔下的勾当来，即使不打算招致祸乱危亡，能够办得到吗？”

元稹还举出唐太宗贞观之治的例子，“太宗刚刚执掌政权的时候，大臣孙伏伽就一件小事进谏，太宗大喜，重重地奖赏了他。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谈论政事的人们唯恐自己讲的不够深挚切实，从来不曾有人担心触犯忌讳。这是太宗认为顺心适意的事时候，侍卫们只好互传食物充饥，不仅对当世全无补益，却反遭后人讥笑，费力不讨好。他们的双耳与双眼、身体与心志并非不勤劳而辛苦，但是他们致力的事情，并不合乎情理啊！”

杜黄裳最后总结说：“一般来说，君主最忌不能推心置腹，臣下最忌不能竭尽忠心。如果君主怀疑他的臣下，臣下诓骗他们的君主，上下不能同心，要以这样的局面来寻求政治修明，不是很困难吗？”宪宗认为他的话极为正确。

【简评】

中国有句古话：“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意思是：厨子虽然没有完成厨房里的工作，但掌管祭祀的人也不会放下自己的事，而去代替厨师的工作。

国家之事，就要充分发挥各种人才的作用，使各种人才执掌各执能部门，明确分工，各司其职。作为一国之君，对国家政务，不论大事小事，都要事必躬亲，也是一种越俎代庖。其结果一是使他自己忙不过来，二也会使大臣们由于皇帝的过分干涉而产生不被信任的心理。

杜黄裳的分析及主张，对我们今天恐怕也有借鉴作用吧！

裴垍巧计捕从史

趋甘避苦，是一般人的正常选择。人都愿意尝甜头，而不愿意吃苦头。

了解到这一点，有的人算计他人时，便先以甜头为饵，引诱之，麻痹之，最后惩罚之。唐朝裴垍诱捕卢从史便是如此。

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年)，昭义节度使卢从史遇到父亲去世而退官守丧，朝廷很长时间没有再起用他。卢从史心中很害怕，便通过左神策军中尉吐突承璀劝说宪宗，希望能得到朝廷的重用，并请求让自己调发昭义的军队前去攻讨叛贼王承宗。

宪宗依从了卢从史的请求，起用卢从史为左金吾大将军，命他率领昭义本部军队前去进攻王承宗。

卢从史虽然第一个提出讨伐王承宗，但他对朝廷长期没有起用他，心存不满，所以，及至朝廷发兵以后，卢从史却停留不前，不肯进兵，暗中却与王承宗互通计谋，让自己的将士暗地里在怀中揣着王承宗的行军标记，以便双方互相照应，避免相互交战；卢从史让粮草官抬高粮食和草料的价格，以便破坏度支的军需供应，并上奏诬告各道兵马与王承宗勾结，不赞成进兵；又派人到处散布说：王承宗防守严密，易守难攻。以此来抬高自己的身价，并暗示朝廷任命自己为平章事。

前方战事不利，宪宗和宰相裴垍十分忧虑。这时，正巧卢从史派遣牙将王翊元入朝奏事。裴垍很想了解前方的实际情况，于是就将王翊元引至一旁，与他密谈。裴垍首先对王翊元讲述了作为人臣应有的义理，不能认贼作父，作有害于国家的事。王翊元被打动，并表达了对朝廷的诚意，将卢从史暗中的所作所为一一讲了出来。裴垍命令王翊元马上回到营中，不要露任任何声色，暗中联络故旧，以孤立卢从史。

裴垍在掌握了全部情况以后，向宪宗上奏献计，择时捉拿卢从史。裴垍说：“卢从史诡计多端，骄横凶暴，肯定要发动变乱。现在听说他在吐突承璀的对面扎营，将吐突承璀当作婴儿一般，十分轻视，在两营之间往来，全然不设置防备。如果失去现在的机会，不将他拘捕起来，以后即使征集大批兵马前去讨伐，也不可能轻易的在短时间内将他平定。”

宪宗起初感到很惊讶，心想：下命令拘捕自己刚刚任命的左金吾大将军是否合适？因此，犹豫不决，迟迟没有下诏。

裴垍据理力争，并把王翊元的话原原本本地讲给了宪宗，宪宗这才下定了决心。

裴垍在得到了皇帝的允诺以后，立即派人到吐突承璀营中，授计诱捕卢从史。

卢从史生性贪婪，吐突承璀按照裴垍所授之计，将许多珍奇的玩赏器物陈列出来，经常邀卢从史来观赏，看他喜欢什么，便逐渐拿来送给他，以博取他的欢心和信任。卢从史果然中计，对吐突承璀所赠玩物十分喜欢，对吐突承璀也愈发亲近，丝毫无再存有戒心。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吐突承璀认为条件已经成熟。

一天，吐突承璀与行营兵马使李听经过商议之后，邀卢从史前来营中听戏，暗中在帐幕后设下了伏兵。

卢从史来到后，由于有了以前的交往，对此次邀请丝毫没有戒意，也没有带几个随从。待卢从史坐定以后，伏兵突然冲了出来，擒获了卢从史，卢从史这才大梦初醒，但为时已晚，被兵士们拉到幕后捆绑起来，押送京城。

裴垍诱捕卢从史一事，首先通过对卢从史牙将王翊元晓之以作为人臣的义理，使王翊元讲出了卢从史的阴谋。裴垍又上书奏请宪宗认可。这样拘捕卢从史有理有据，而且名正言顺。

裴垍也了解到卢从史诡诈多端，但有生性贪婪的弱点，于是先让人给他送去很多珍宝，博取他的欢心和信任，使其丧失警惕，结果，卢从史终于被他信任的人所生擒。

【简评】

致鱼死命者，钓饵也。

致鸟入罗者，诱食也。

致人身亡者，财宝也。

古往今来，以财宝为饵之事不计其数，甘愿上钩之人也数不胜数。设计者以极小的付出钓得大鱼，可谓吃小亏占大便宜。中计者为区区小利而失去性命，岂不亏到家了吗？

宣宗树威立制

先秦法家商鞅说过：“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

在他看来，力、强、威、德是循环往复的。

唐宣宗是个有威严的皇帝，其威竟令下臣在冬季里汗流浃背。

他的威严来源于何处呢？

唐宣宗晚年颁布诏令，命令各州刺史不得调到其他州做官，凡调动者，必须先到京师长安朝见皇帝，由皇帝当面考察其是否胜任政务，然后再委任官职，这一项规定遂成定制。

宣宗新委任官员，都要叮嘱其要忠于职守，慈善为官。

新任建州刺史予延陵临上任前入朝向唐宣宗谢恩辞行，宣宗说：“建州距离京师有多远？”于延陵回答说：“八千里。”唐宣宗说：“你到建州后为政的善恶，朕都知道，不要以为距离朝廷太远就胡做非为！万里之遥就象在台阶之前一样，你知道吗？”予延陵被吓得惊恐失措，应对错乱，唐宣宗抚慰他并让他出宫。

定下此制度后，宣宗希望大臣严格执行。宰相令狐绹曾经将其故旧迁任邻州刺史，未到京师就顺路赶到任所上任。唐宣宗见到这位刺史所上的谢恩表文，就其不到京师朝见皇帝一事询问令狐绹，令狐绹回答说：“因为所迁州治任所较近，所以没来长安，以省去迎送的礼节。”唐宣宗说：“朕以天下各州刺史大多用非其人，成为百姓的蠹害，所以想一一朝见，当面询问他们上任后的施政方略，以知道他们的优劣，便于对他们进行升降黜陟。然而，我的诏令既然已经颁布，你却废弃搁置不用，看来宰相有权也真是可畏！”

令狐绹怕皇帝以无视圣旨而怪罪自己，吓得浑身发抖。当时天气很寒冷，令狐绹竟至汗流浃背，连几层衣服都湿透了。

唐宣宗临朝听政，从来无倦意。每次宰相奏对政事，近旁设有一人站立，其威严的神态令人不敢仰视。令狐绹曾对人说：“我当了十年宰相，操掌政柄，最得皇上的恩遇，但每次与皇上奏对政事，没有不汗流沾衣的！”

每次在宰相奏事完毕后，宣宗忽然会怡然放松地说：“我们可以谈些闲话了！”接下来就问宰相们街道闾巷的细微事，有时谈论宫禁中游宴的事，凡琐絮之事无所不谈。

唐宣宗聪明细致，沉着果断，用法不徇私情，能虚心纳谏，从谏如流，不轻易将官位赏人，谦恭谨慎，生活节俭，爱护百姓的财物，所以，在唐宣宗统治时间，政治比较清明，一直到唐朝灭亡，都有人对他思念歌咏，称唐宣宗为小太宗。

唐宣宗因各州刺史大多“用非其人”，有的甚至成为百姓的祸害，因而立下了刺史调任，须首先进宫，由皇帝亲自考察，看其能否胜任政务这样一种制度。希望部下严格执行。宰相令狐绹故旧迁临州任刺史未进京朝见皇帝事，宣宗认为这是对皇帝颁布诏令的轻视。“宰相有权也真可畏！”一句话，示意令狐绹，这种作法是无视皇帝权威的行为。

此后，宰相们对国家大事，再不敢私作主张。

【简评】

封建社会，皇帝的权威至高无上。

同是权威，立威之途各异。

商纣王暴虐，对臣下动辄截肢、剖腹、炮烙，此为以酷立威。

三国吴皓，滥杀大臣，生杀任性，此为以杀立威。

唐宣宗严格执行刺史能力考察制，对他们亲自考察，根据他们的优劣决定升降，此为以严明立威。

凡是权威都可畏，但有的权威令人畏而不服。

只有令人畏而心服的权威才可长久维持。

巧用间计除盗贼

《利、子兵法·谋攻篇》中说：“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这是指在军事战争中能够做好对敌方的宣传、瓦解工作，就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战争是如此，缉盗也是如此，唐代的崔安潜曾在蜀地缉捕盗贼中，就是用了《孙子兵法》中的攻心战术。

西川地区是汉族和少数民族杂居地区，地方治安很乱，盗贼很多，居民家中的粮食、财物、牲畜经常不翼而飞，人们怨声载道，希望官府有人出面治理一下。

西川的前几任官吏不是因为没能力治理盗贼问题就是官匪相通，因而使困扰当地居民的盗贼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也因此都被罢了官。

唐僖宗乾符六年(879年)四月，崔安潜被任命为西川节度使。崔安潜上任一段时间，除了处理一般政务以外，没有提及盗贼扰民问题，蜀中人感到很奇怪，私下议论说：“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可是也没有看到咱们的新官对盗贼问题有什么处理的新方法，莫非又与以往的官吏一样，老百姓的生活真难啊！”有人把这些街头巷尾的议论报告给了崔安潜。

崔安潜听后淡淡的一笑说：“这里的盗贼扰民问题的确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但以往盗贼之所以如此猖獗，是因为捕盗官吏的通容，以致使盗贼久禁不绝。如果我们还按照以往的办法去捕盗，派很多人去搜捕，等于用拳头打跳蚤，我们在明处，盗贼在暗处，来无影，去无踪。况且，盗贼脑门上也没有写着自己是盗贼，因此，派人进行大规模搜捕不仅劳民伤财，而且徒劳无益。这也是以往官吏禁盗贼而不见效的原因。”

崔安潜又说：“对待这里的盗贼必须有个万全之策。”他对下人耳语了一番，让下人按照自己的吩咐去准备。

初五这天，崔安潜拨出节度使府库钱一千五百缗，分别放置在成都蚕市、药市、宝市三处闹市，在市上张榜，称：“有能告发并逮捕一个盗贼者，赏钱五百缗。盗贼不可能独自一个人行窃，必定有同伙，若同伙告发可以释免告发者罪，和平常人一样领赏，希望大家奋勇缉盗，绝此祸患。”

这一招果然奏效，告示贴出不久，就有人捕获盗贼来到官府，盗贼不服，说：“你与我同伙为盗已十七年，赃物都是平分，你怎么敢逮捕我，即使到官府，你与我一样，也要被处死。”盗贼抱着与以前的同伙同归于尽的想法来到蚕市。

告示贴出以后，为了验证自己的计策，崔安潜经常骑马到三市巡视。

崔安潜看到一个人押着另一个人来到蚕市，被押解的人还有些不服气。于是，对盗贼说：“你既然知道我有榜，为何不将你的同伙逮捕送官府，如果你这样做，他就该处死，你就该受到奖赏了。现在你既然被他先告发，还有什么话好说！”捕贼的人立即得到了赏钱。赏金当着盗贼和围观群众的面当场兑现，盗贼耷拉着脑袋无言以对，围观的群众拍手称快，赞叹节度使除盗贼的新方法。

盗贼被押到市上刷死，并诛灭其一家。此事传出以后，诸盗贼与他们的同伙互相猜疑，惶惶不可终日，在成都无容身之地，纷纷逃离西川，有的洗心革面，不再操旧业。从此，西川境内盗患大减。

【简评】

盗贼之为惯贼，是为利所驱；以利诱之，张榜悬赏，使其同伙互相告发，则又是巧用反间之计。崔安潜吸取以往大队人马缉捕而又劳而无功的教训，几乎不用一将一卒就使蜀地消除盗贼祸患，确是令人拍案称道。崔氏计谋的缜密、精妙之处，还在于他公开在街市上颁赏，使告发者与被告发者分别得到了不同的发落，从而让广大的群众知道官府的公平与言而有信，使捕盗的工作更能够广泛开展，这也是善于用计者之所为。

张承业果断定大计

现如今，有谁再说吃饭是为了填饱肚子，只能给他得 50 分。因为吃饭除了填饱肚子之外，的确还有许多其它功能。

大腹便便的老板们，坐在饭桌前大谈生意经，很多买卖在杯盏交错间成交。饭桌已成生意场。

一对新婚伉俪，摆下丰盛宴席，请来所有宾朋亲友。此时宴席已成为主人的新婚发布会。

此外，吃饭可交友，可行贿，可斗富……

五代时的张承业，利用吃饭解决政治问题。

公元 908 年，晋王李克用头上生出毒疮，病势沉重。他知道自己的病已无法治了，就把担任内外蕃汉都知兵马使、振武节度使的李克宁，监军张承业，大将李存璋、吴珙，掌书记卢质等亲信招到病榻前，吩咐他们同心合力，辅佐他的儿子、晋州刺史李存勗继承王位。李克用说：“这孩子眼光远大、心胸宽阔，一定可以完成我的事业，你们要好好协助教导。”临终前，他对李克宁和张承业说：“我把亚子托付给你们了！”亚子，是李存勗的乳名。话刚说完，李克用就逝世了。李克宁是李克用的弟弟，他接管了王府军政，无论内外，没有人敢乘机闹事。

李克宁长期手握兵权，位高权重，有兄终弟及、接替李克用官爵的可能性。当时，晋军与后梁对峙，军事形势严重。将领们认为李存勗年纪还轻，威望不足以服众，很多人交头接耳，私下议论，军心震荡不安。李存勗见此情景，心中恐惧不安，便请求把官爵让给叔父李克宁。李克宁不接受，对他说：“你是嫡长子，理应继承，何况又有先王的命令，谁敢违抗！”文武官员打算参见李存勗，李存勗正在灵柩前悲哀哭泣，不能马上出来。张承业原为宦官，事奉李克用十分忠心，又受李克用托孤之命，感到情势严峻，便到灵堂对李存勗说：“最大的孝，是完成你父亲未竟的大业，光哭有什么用！”于是他扶李存勗出来，登上公堂，正式就任河东节度使和晋王的爵位。李克宁率各将领叩头祝贺，李存勗把军政大事，全都交给李克宁处理。

起初，晋王李克用收养了很多勇士健儿，当作义子，对他们的宠爱和待遇，跟对亲生儿子一样。现在，李存勗继承了官爵，其他义子的年龄都比李存勗大，而且都手握军权。他们据功自傲，并不把新王放在眼里。有的声称有病，在家疗养；有的不服统领，看见新王也不行礼。李克宁手握大权，地位尊贵，军心都盼望他能继承王位。义子李存颢，这时便暗中游说李克宁，说：“兄死弟及，自古以来就有这种情况。何况，叔父向侄儿叩头称臣，在道理上怎么说得过去！上天把机会交给你，你却拒绝，后悔时恐怕就来不及了。”李克宁喝斥他说：“不许胡言！我们李家，世世代代以父慈子孝闻名于世。先王的功业只要能交给合适的人继承，我还有什么要求！你不要挑拨离间，看我不砍下你的人头！”李存颢见此，也就再没吭声。李克宁的妻子孟氏，性情刚愎强悍，义子们就纷纷派妻子到李克宁家游说孟氏。孟氏贪图荣华富贵，见有这么多人拥护，就同意了。她害怕阴谋泄露会招来大祸，所以不断催逼李克宁早点下手。李克宁性情软弱，缺乏主见，被这些人日夜包围煽动，不能不有点动心。

而李克宁又跟张承业、李存璋的意见不合，屡次对二人讥诮斥责。他对李存昂的态度也变得不如以前那么恭顺了。不久，李克宁擅自诛杀了都虞侯李存质。李克宁又请求另行设立大同节度使，由自己统领，管辖蔚（今河北省蔚县）、朔（今山西省朔州市）、应（今山西省应县）三州。李存勗都听从他的决定，没有表示反对。

李存颢等人见时机渐渐成熟，便为李克宁设计政变的行动方案：利用李存勗到李克宁家的机会，发动政变，诛杀张承业、李存璋，拥护李克宁为河东节度使，献出河东的九个州府，投降后梁。生擒李存昂、连同太夫人曹氏解送大梁。这一计划确定后，李克宁就开始行动了。太原人史敬镕，从小追随李克用，一直在手下做事，很受宠爱信任。李克用死后，他对李克宁也很恭敬。李克宁打算探知王府秘密，觉得史敬镕可以依赖，就把他召来，把秘密计划告诉他，许诺事成后将有重赏。史敬镕表面上承诺合作，但一进王府，便马上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太夫人曹氏。曹氏大惊失色，立刻召见张承业，指着李存勗对他说：“先王握着这孩子的手臂交给你们，让你们尽力辅佐。如果听到外面政变的阴谋，打算改变立场，那我只求你把我们母子安置一个地方就心满意足了，不要把我们送到大梁，其他不敢多求！”张承业惶恐，急忙说：“老奴即令一死，也会奉行先王命令的，太夫人怎么说这种话？”李存勗这才把李克宁的阴谋告诉他，并且说：“骨肉至亲，不可以互相残杀，我如果辞位让爵，大乱就可以避免。”张承业说：“你想得太简单了。李克宁打算把大王母子投入虎口，你以为把爵位让他就没事了？你一旦失去兵权王位，那就等于缚住手脚让人杀戮。如果不把李克宁除掉，大祸是无法避免的。”李存勗这才下定决心。他召李存璋、吴珙，及义子李存敬、长直军使朱守殷，命令他们暗中作反政变准备。张承业对具体方案作了周密安排。

李存勗在王府大庭摆设筵席，大宴各军将领。待到酒过三巡，李存昂发出暗号，伏兵一跃而起，就在座位上逮捕李克宁、李存颢。众人一阵慌乱，但见戈甲森严，谁也不敢乱动。李存勗宣布了李克宁发动政变的罪行，并痛哭流涕地数落李克宁说：“侄儿一开始就把官爵让给叔父，是叔父自己拒绝的。而今，大事已定了，为什么要用这种阴谋，忍心把我们母子送交仇人之手？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呀！”李克宁到了此时，真是无言以对，只是说：“这都是野心小人煽风点火。事已如此，我还能说什么。”当天，李克宁及李存颢就被处死了。此事距李克用临终托孤，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李克宁最初接受晋王李克用嘱托时，对李存勗还是忠诚恭顺的。但后来却惑于权位、外受野心小人之煽动，内溺恩圃悍妻之骄横，阴谋政变，终至事泄被诛。张承业同受托孤之命，始终如一，在事情的关键时刻，识大局、明大体，果断处事，终于使新即位的晋王地位得到巩固。他的果断和明智，显示出一位老臣丰富的宫廷政治斗争经验。

【简评】

封建社会，权力就是一切。

追求权力的欲望，把人变成了杀人狂，变成六亲不认的冷血动物。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丕兄弟争权，在这首诗中得到生动的反映。

“遥望建康城，小江逆流萦，前见子杀父，后见弟杀兄。”这首诗是南朝刘宋皇室父子兄弟残杀的生动写照。

权力，只有在不为一家一姓的私利而行使时，才能体现出纯洁和神圣。

冯道以诗谏主

语言文字，有雅俗之分，深浅之别。所以，取何种形式要看对象，实在是一条重要原则。适合对象，就会事半功倍，否则，将会曲高和寡。

后唐明宗李嗣源以武力夺取天下，即位时已六十岁。他鉴于庄宗的失败，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中原的农业生产有所恢复。明宗文化水平低，曾夜间焚香、仰天祷告说：“我本番人，哪里能够担当得起治理天下的重任。天下混战变乱已太久了，愿上天早生圣人。”话尽管这样说，明宗在用人纳谏方面，还是表现出相当的治国才能的。

冯道在明宗时作宰相，明宗常常向他询问民间的疾苦。在一次随意的谈话中，明宗提到几年以来，庄稼一连丰收，四方太平，没有动乱。冯道说：“我曾经记得、当年在先帝（李克用）手下充当幕僚时，奉派前往中山（今河北省定州市），穿越井陉，路面狭窄，险象横生，担心马失前蹄，所以小心翼翼拉住缰绳，上天保佑，没有闪失。可是出了井陉，走到平坦大道。为了偷懒，把缰绳放开，由马奔跑，不久就一下子栽倒。治理国家，跟这种情形一样。”明宗深深点头，又问道：“今年庄稼丰收，人们是不是富足？”冯道说：“农民遇到歉收，就饿死荒野；遇到丰收，粮价却又猛跌。不管歉收丰收，都要受苦受难的，只有农家。我还记得进士聂夷中的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偏照逃亡屋。’诗虽然通俗，但道尽农民困境。士、农、工、商中，农家最勤劳辛苦。陛下宜时时记之。”明宗十分高兴，说：“这首诗非常好。”他马上命令侍臣把聂夷中的这首诗写下来，常常背诵。

冯道为饱学之士，熟知古代典籍，长于篇咏，为文于典雅之外，亦含古道。但他深知明宗出身行伍，文化水平又低，所以他对明宗进谏，总是采用非常通俗和明白的语言、事例，以便君王理解接受。根据对象的实际情况，采用恰当的表达方式，这既是一种语言的艺术，也是一种高明的策略。

【简评】

雅与俗、深与浅之间，常存在一条鸿沟，对于有些人来说很难逾越。他们满腹经纶，理论高深，但不能用浅显通俗的方式表达，以使更多的人接受。

跨越这条鸿沟，举重若轻，谈雅似俗，论深如浅才是更高的层次。

明宗忍痛诛太子

世界上有很多事的发展及结果是令人无可奈何的。

马谡是诸葛亮手下的爱将，诸葛亮曾把守街亭的重任交给他。然而他却志大才疏，言过其实，不能完成重任。最后，诸葛亮只能挥泪将其斩掉。为严肃军纪，迫不得已，不如此，又怎么办呢？

杨贵妃是唐玄宗的心爱之人，唐玄宗曾为她“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但安史之乱，唐玄宗逃难，马嵬坡前，众军一致要求杀死杨贵妃，否则不予保驾。唐玄宗无奈，只得将爱妃缢死。为了安定军心，保驾活命，不如此，又怎么办呢？

五代时，后唐明宗李嗣源诛杀皇子李从荣，也是出于无可奈何。

后唐明宗李嗣源，是五代时不多见的贤明之主，“不迩声色，不乐游畋，在位七年，于五代之君，最为长世，兵革粗息，年景屡丰，生民实赖以休息。”但他在立太子的事上，却没能患患为防，终至父子交恶，刀兵相见。

明宗有四个儿子，长子从璟跟从庄宗征战，屡建功绩，被庄宗收为己子。明宗军变，从璟因故被杀。从璟死后，诸皇子中年最长的就是次子从荣了。他天成元年（926年）以检校司徒兼御史大夫、拜天雄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长兴元年（930年），拜河南尹、兼判六军诸卫事。从荣年长，又握有兵权，位高权重，明宗对他寄予了很大希望。但从荣为人轻浮而傲慢，喜欢浮文藻饰，附庸风雅。他招纳了许多文学之士，常常歌舞欢宴，饮酒赋诗。所以那些浅薄轻躁之徒，成天恭维奉承来满足他的骄矜之心。将相大臣们对此都深感忧虑，

明宗也察知此中弊害却无法加以裁制。从荣曾在明宗身边侍问，明宗问他说：“你军政余暇，都做些什么呢？”从荣回答说：“有空我就读书，同儒士们讲论经义。”明宗说：“经义中有君臣父子之道，但须有硕儒端士，才可以亲近。我见先帝喜欢作歌诗，很没有意义。你是将门之子。文章不是你所平素擅长熟习的，肯定做不好，传到外面去，只能被人讪笑。我老了，对经义虽然不能通晓，但还是很喜欢听到的，其余的就不值得学了。”

长兴元年秋，明宗封从荣为秦王。按照惯例，诸王受封不朝拜太庙。而主管大臣迎合明宗的意旨，想使受封的礼仪隆重，就建议说：“古今情况不一，现在秦王受大封而不告太庙，不是敬顺之道。”于是从荣朝服华贵，乘辂车，仪仗隆重，到朝堂受册命。出朝后，把册命载于车中，去太庙朝拜。京师的人都认为这样的仪式太荣耀了。长兴三年（932年），明宗又加封从荣兼中书令。主管大臣又进谏说：“按惯例，亲王列在宰相之下。现在秦王位高而班下，不相称。”于是秦王与宰相分班而居于右。

长兴四年（933年），秦王李从荣又被加封尚书令，食邑万户。太仆少卿何泽上书，请立从荣为皇太子。这时，明宗已经病了，看到何泽的奏书，十分不高兴，对左右的人说：“大家想立太子，我就该回河东养老了。”他便召集大臣商议立太子的事，大臣们都不敢说话。从荣进去说：“我听有奸人妄言，想立我做太子，我其实并不愿意。”明宗说：“这是群臣的愿望罢了。”从荣出来后，去见宰相范延光、赵延寿等人说：“你们商议想立我做太子，是想夺我的兵权，把我幽禁到东宫里吧。”范延光等听到这样的话，惶惶不安，就又表奏加从荣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主管官员又进奏说：“元帅或者统帅诸道的军队，或者专治一面，从前世看没有大元帅的名称，礼仪无法考按执行。请求自节度使以下，凡率领军队的将领，全都可以军礼在庭中参见；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将领，初见时也同样，以后准许用客礼。凡元帅府文书符命行于天下，都用帖。大元帅班列应在宰相之上。”李从荣的权欲得到满足，更加骄横，在元帅府大摆宴席庆贺，诸将都得到赏赐。从荣又请求拨严卫、捧圣两营中千人作自己的卫队，每次进宫晋见，仅随从就有骑兵数百名，弓上弦、刀出鞘，奔走驰骋在官道上，路人见到，都惶惧躲避。从荣还命僚属作《征淮赋》，陈述他平定天下的志向。

朝廷有关官员呈请替亲王们择师缚，来加以训导。各宰相畏惧秦王从荣，不敢迳行任命，而请他自己选择。从荣请求让翰林学士崔棁、刑部侍郎任赞做元帅判官。明宗说：“翰林学士要代我说话，这不可以。”从荣出来后恼怒地说：“让我做元帅又不让我挑选僚属，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将相大臣们看到从荣权位越来越高，却这样轻率放肆，都知道会招来祸患，却不敢直言。只有范延光、赵延寿心中惶惧，屡次晋见明宗，涕泣请求解除枢密使的职务，调往外地，用来躲避从荣。两人好不容易才得到批准外调，而从荣的祸难也就发作了。

这年十一月十六日，明宗旧病复发。第二天病势沉重。秦王李从荣与枢密使朱弘昭、冯贊进宫问候，明宗已不能知人。王淑妃告诉说：“从荣在这里。”明宗没有反应。李从荣退出，听到宫中一片哭声，认为明宗已死，就声称有病，第二天没有入宫，却不知夜晚明宗病情已稍稍好转。从荣知道自己的恶劣行径，不会被人接受，恐怕不能继承帝位，于是跟他的党徒商议，打算带兵入宫，先控制内宫以篡权。十一月十九日，李从荣派都押牙马处钧询问朱弘昭、冯贊说：“我准备率领警备部队入宫宿卫，请问应该驻扎在什么地方？”两人回答说：“宫中您都可以驻扎，请您自己决定。”然后，以私人友谊告诉马处钧说：“皇上龙体平安，大王应该尽忠尽孝，不可草率从事。”李从荣大怒，再派马处钧对二人说：“你们就真的不爱惜家人性命了吗？怎么敢拒绝我的要求？”两人深为忧惧，进宫禀告王淑妃及宣徽使孟汉琼，大家都认为：“这件事必须得到侍卫兵支持才能成功。”于是召来侍卫指挥使康义诚共同商议对策。康义诚的儿子是李从荣的部下，所以康义诚不肯参与决策，只说：“我是一个军人，不敢参与国家大事，完全听各位宰相吩咐。”朱弘昭听他这样说，大为恐惧。

十一月二十日，李从荣采取行动了。他派马处钧告诉冯贊说：“我今天决定率军入居兴圣宫。”又告诉康义诚，康义诚许诺迎接。冯贊骑马飞奔入宫，看到朱弘昭，康义诚、孟汉

琼等正坐在中兴殿门外讨论如何应付。冯贊责备康义诚说：“皇上所以提拔栽培我们，就是为了今天这样的事。现在是危机时刻，间不容发，你不应该因儿子在秦王府供职，就左右观望。如果秦王的军队一旦进入宫门，将把皇上置于何地？我们的家族难道还会有一人活命吗？”康义诚还没有回答，宫门守卫报告说：“秦王率军已抵达端门了。”孟汉琼拂袖而起说：“我的性命微贱不足惜，我自当率军抵抗。”立即进入殿门，朱弘昭、冯贊尾随，康义诚不得已，也只好进殿。

孟汉琼晋见明宗说：“从荣兵变，军队已攻到端门。”宫女宦官们面面相对，放声大哭，明宗问朱弘昭等说：“有没有这回事？”回答说，有这回事，已传令守卫关闭宫门。明宗举手指天，泪流满面，对康义诚说：“你自己斟酌处理，不要让京城受到惊扰。”控鹤指挥使李重吉是潞王李从珂的儿子，当时侍候在明宗身旁，明宗说：“我和你父亲从微贱中起事，冒着飞石流箭，平定天下，你父亲很多次把我从危险中救出来。从荣这等人，出了什么力，居然做出这种叛逆的事。你赶快派兵守住宫门。”李重吉马上率控鹤士卒守卫宫门。

这天，李从荣从河南府率领步骑兵一千多人出发，陈兵在天津桥上。他坐在胡床上，派左右侍从召唤康义诚。可是端门已经关闭，侍从敲叩左掖门，从门缝往宫里窥视，只见捧圣指挥使朱弘实率骑兵从北而来，急忙回来报告李从荣。李从荣大吃一惊，命取防箭铁背心穿到身上，自己调好弓弦。皇城使安从益率三百骑兵冲上来，李从荣的军队射箭抵抗，从益军稍稍退却。朱弘实率骑兵五百人已从左掖门冲出，很快骑兵大量集结，李从荣一看情势不好，急忙逃回河南府，幕僚及左右侍从一哄而散，警备部队趁势大掠所在的嘉善坊，全军瓦解。李从荣跟妻子躲到床底下，被皇城使安从益拖出来，当场斩首。

明宗听说李从荣已死，悲苦惊骇，几乎从御床上掉下，昏死又复苏好几次。宰相冯道率文武百官进宫晋见，明宗说：“我家的事情竟到这种地步，无脸跟你们相见。”君臣相顾，泣下沾襟。明宗决定召次子宋王李从厚进宫承嗣大统。过了六天，明宗的病情加重，不治而亡。

明宗李嗣源为人纯质，宽仁爱人，奉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有意于治世的出现，在五代的君王中，多有可称道之处。但他出身行伍，轻视文治，仁而不明，处理政事常有粗率简单之处，多次以偏听偏信而诛杀臣下。对秦王李从荣，李嗣源寄托了很大希望，所以屡次加封。李从荣权重位高，颇少检束，而明宗不能事先有所防范，加以制约，终于酿成了秦王叛乱、身首异处的悲剧。明宗最后不得已采取了平定叛乱的措施，实为无可奈何的下策。

【简评】

俗话说：教是爱，溺是害。

明宗对儿子从荣寄予厚望，屡次加封，不可谓不爱。当他迫不得已，将李从荣诛杀后，悲痛得死去活来，可见仍未失去爱子之情。

如果他对儿子及早严加管教，制止他的骄纵，结果是不是会好一些呢？

种瓜得瓜，种豆种豆。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终究要承担责任。

孟昶立威悯民

人们都喜欢立志：

学子好立成才之志。

商人喜立致富之志。

官员爱立廉政之志。

帝王呢？都说要励精图治……

然而，立志容易，守志则难矣！

后蜀后主孟昶于934年继位，做了30多年的“偏霸之主”。他在位期间，既有奢华淫

的一面，也有精明干练、有智有谋的一面，有些善政还是颇值得称道的。

孟昶即位时才 16 岁，将相大臣都是孟知祥的老部下，不把这个年幼的皇帝放在眼里。这批勋臣旧人骄恣不法，为所欲为，公然超逾法度，建造豪华第宅，规模巨大，以致夺人良田，发其坟墓。其中尤以李仁罕、李肇、张业、赵廷隐最为骄纵嚣张。孟昶刚即帝位，大将李仁罕便提出主管六军的要求。他不但派人到枢密院提出要求，还到学士院看是不是照他的要求起草命令。这一目无幼主、咄咄逼人的举动深深地刺激了孟昶，他知道这样下去意味着什么。但他隐忍不发，先接受条件，任命李仁罕为中书令，判六军事。然后，等李仁罕进宫朝见时，孟昶命令武士将他捉住，当场杀死。昭武节度使兼侍中李肇到成都来朝见新君，他假称脚上有病，拄着拐杖上朝，见了孟昶，不肯跪拜。李仁罕一死，他吓得魂不附体，顿时丢掉拐杖跪了下去。孟昶以其倨慢，勒令他退休，徙居邛州（今四川省邛崃县）。

张业是李仁罕的外甥。李仁罕被杀时，他正执掌禁军，孟昶怕他反叛，当时不敢动手，遂千方百计加以笼络。甚至用他做宰相，又兼判度支（财政）。张业在家里私设监狱，关押欠债的人。他制定了一种“盜税法”，规定税官吞没赋税的，照吞没的数目十倍罚款。税官受了罚，按照“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法则，自然如数从百姓身上勒索。这种酷苛的税法使得百姓难以承受，怨声鼎沸。孟昶闻知，废除了十倍罚款的办法。到了后蜀广政十一年（948 年），孟昶觉时机已到，遂与禁军将领安思谦密谋，用诛灭李仁罕的老办法，把张业在都堂上捉住杀死。卫圣都指挥使兼中书令赵廷隐见事不妙，自请退休。至此，故将旧臣基本上被除尽了，孟昶

才算是真正掌握了国政。

孟昶在朝堂上设了匦（小箱子），鼓励臣下投书进谏。孟昶喜欢打球骑马，又为方士房中之术，多采良家予以充后宫，枢密副使韩保贞劝谏，孟昶大悟，当时便命令放还，还赏赐给韩保贞金数斤。有人上书论事，孟昶认为说得不对，左右近侍请求把上书的人喊来诘责。孟昶说：“我看到唐太宗刚即位时，狱吏孙伏伽上书言事，虽忤上意，却都受到嘉许，为什么你们却劝我拒谏呢？”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孟昶曾亲笔撰写了《官箴》，颁行各郡县。其辞曰：

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存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切，军国是资。朕之爵赏，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人父母，罔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

孟昶亲政之初，还是颇知节俭的，表示要吸取前蜀王衍因骄奢淫佚亡国的教训。他撰写的这篇《官箴》，晓谕地方官不要过分剥削人民，具体效果如何，不得而知。但其中的鉴戒意义却是为后世有见识的统治者所肯定和吸取的。北宋太宗就采取其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等八句，亲书颁赐州县，立于厅事之南，称《戒石铭》。由此看来，孟昶的诏书在当时还是起过一定作用的，对后世也有一定影响。

【简评】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句话用在后蜀后主孟昶身上恰如其分。他在台之初，抑制权臣，加强集权，立官箴，鼓励臣下投书进 1 束；其亲笔所书的《官箴》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人父母，罔不仁慈”等句，深念民瘼，体恤下情，成为后代君主的箴诫、座右铭，确颇有励精图治的英明君主模样。可惜执政后期，骄奢淫逸，任用佞臣，夺人妻女，国政日衰，以至宋兵压境之际，城上树降旗，身为阶下囚，几死人手，为后世所不齿！人能立志本不难，难在守志不移，孟昶亡国之鉴戒，确乎深刻。

李从珂鼓励进谏

有一种人总爱为自己的无能或过失寻找种种理由。

字写得不好怨笔歪，箭射得不准怨弓硬。这种人说得雅一点是“文过饰非”，说句大白话就是拉不出屎赖茅房。

后唐的宰相卢文纪就是这等人。

后唐末帝李从珂靠变兵拥立即位后，面临非常严重的局势。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拥兵自重、虎视眈眈，而朝廷内部则人心涣散，互相猜忌，各种矛盾和弊端积重难返。李从珂对时局发展深感忧虑，很想有所作为。他抱怨宰相卢文纪等从没有提出一点对朝廷军国大事有裨益的建议。卢文纪等上疏辩解说：“我们每隔五天进宫问候陛下起居平安，跟文武两班官员列队晋见，时间短暂，虽有例行的对话，但满眼都是侍卫，即令有一点浅见，也不敢当众提出。请陛下恢复前代皇帝延英殿奏事制度，只允许宰相和负责机要的臣属在旁侍候。”

李从珂闻奏，很不以为然，下诏说：“旧制五天进宫一次，文武百官退出后，宰相可以独留，如果是一般性事务，不妨当众奏报。如果事属机密，当天不合适时，则任何一天，都可以先到宫门呈报，我自会把左右侍从全部遣开，在便殿接待，何必一定要沿用延英殿奏事的名义。”

李从珂的不满，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卢文纪的确没有提出什么有价值的建议，倒是一些下级官员的奏信颇有见地。

太常丞史在德，性情疏狂鲠直，上书对朝廷及地方文武官员一一抨击，请求普遍举行考试，根据成绩升迁或罢黜。他在奏疏中说：“朝廷用人，差不多都是滥竽充数。号称‘将领’的人，没有军事常识，虽然身穿军装，手拿武器，可是会战时却丢盔卸甲，失败时则背弃部属，先行逃走。号称‘文官’的人，很少有真正本领、反而品德恶劣，当询问他意见时，则口呆目瞪，说不出话；写篇文章，也不得不请人代笔。这正是所谓虚设官职，浪费国家财力。现在陛下维新中兴，正是改革弊政的时机。我建议所有军官，凡是身穿铠甲的，请下令本军大将，一个一个检查他们的武艺，考试他们的兵法谋略。居低位而有将才的，擢升他为大将，居高位而没有将才的，贬作低级军官。至于文职官吏，则由皇上亲自出题，命中书令或宰相，对他们当面考试，居下位而有大才的就擢升他任高官，居上位而没有大才的，就贬作低级官员。”

史在德这封奏章，可是惹恼了宰相和在位的官员。卢文纪及补阙刘涛、杨昭俭等，都怒不可遏，一致要求对史在德严厉惩罚。李从珂对翰林学士马胤孙说：“我刚刚登极治理国家，言论应该开放，如果官员中因为提出意见被定罪，以后还有谁再敢说话？你替我起草一份诏书，使大家了解。严于是下诏说：“过去，魏征请求太宗奖赏皇甫德参；现在，刘涛等人却要我处罚史在德。两件事情相同，建议却不一样，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史在德只是想为国尽忠，怎么可以责罚！”

【简评】

对于一个君临天下的封建皇帝来说，百姓不言和臣下不言都是一件可怕的事。

百姓不言，说明他们在默默地积怨，总有一天会在沉默中暴发。

臣下不言，说明他们对朝廷早已失去信心，对其生死存亡漠然置之。

李从珂是五代后唐的末代皇帝，然而他不信谗言，不堵塞臣下言路，这是他的开明之处。后唐亡于季从珂，然而史书上对他的记载极取同情态度。

人们不会因一个人的成功而把他写得处处皆是，同样，也不会因一个人的失败而把他看得事事皆非。

铜柱勒铭定溪州

俗话说：“入乡随俗”、“到什么山，唱什么歌”。

中国少数民族众多，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习俗，特定习俗，反映了特定民族的文化心理、文化认同。

利用习俗的力量，往往会收到巨大的效果。

五代时期，据于湘西、统领土家诸部的是彭氏兄弟父子。彭氏兄弟原本是吉州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市)赤石洞的酋豪，后入湖南，投靠楚王马殷，得其扶植，于是据有溪州(今湖南省西部)。彭氏兄弟强力而有谋略，善结人心，广聚财力军士，诱胁诸蛮而归之，虽说属楚统辖，却恃仗山势险要、地形复杂，自行其事，不受节制。他们春夏营种粮食，到了秋冬，便四出掳掠抢夺，长沙四境受其患最多。马殷在时，对他们多加容忍，而他们慑于马殷的恩威并举，也还不至于超分作乱。到马殷死后，次子希声、四子希范踵继为楚王，情况就不太一样了，侵扰不断升级。

南楚文昭王天福四年(939年)，溪州刺史彭士愁，引导奖(今湖南省新晃县东北)、锦(今湖南省凤凰县)二州土家诸部一万余人，进攻南楚所属的原(今湖南省沅陵县)、澧(今湖南省澧县)二州，烧杀掳掠南楚边防部队，并派使节前往成都向后蜀帝孟昶请求支援。孟昶认为道路太远，没有答应。

南楚文昭王马希范命左静江指挥使刘勃、决胜挥舞使廖匡齐，率衡山兵五千人讨伐彭士愁。刘勃率军进攻溪州，(今湖南省永顺县)，彭士愁战败，放弃城池，逃往山寨继续抵抗。山寨周围都是悬崖峭壁，刘勃建造高梯，开凿栈道，爬到上面，把山寨团团围住。可山寨地形险要，难以攻破。刘勃仔细观察了地形，确定了进攻方案。这天，刮起了大风。刘勃派人从上风发射火箭，彭士愁的大寨中到处起火，楚军趁势进攻，彭士愁无法抵挡，率部众逃入奖(湖南新晃县东北)、锦(湖南凤凰县)二州的深山。楚军继续追击，彭士愁穷蹙无计，派其子彭师嵩率各酋长缴出溪(湖南永顺县)、奖、锦三州印信，向楚军投降。

刘勃班师，将彭师嵩带回长沙为质。南楚王马希范见大军凯旋，非常高兴。马希范自称东汉名将马援后裔，仿效马援于交州立铜柱的故事，在溪州铸立铜柱，这就是保存至今的“溪州铜柱”。铜柱用铜五千斤铸成，柱呈六棱形，内空，柱面铸有2118字，楚天第府学士李宏皋撰写铭文。这篇铭文反映了马希范平湘西的策略和措施，对西南地区的稳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铭文可知，马希范平溪州后，采取了如下措施：

- 一、保持各部首领旧有官职，世代承袭。
- 二、二叛之后，赏赐诸州首领、将吏，发粟赈贫。
- 三、赋税仍依旧制，且留本州自用，楚廷不向溪州征赋抽兵。楚廷需用的“溪货”，土产，仍按旧章办理。
- 四、禁止诸部头人等越界劫掠，诱纳逃人。
- 五、移溪州治所于平岸，以便控制。

铭文最后立誓曰：“王者之师，贵谋贱战，兵不染锷，士无告劳。肃清五溪，震警百越，后平疆理，保卫邦家。尔宜无扰耕桑，无焚庐舍，无害樵牧，无阻川涂，勿矜激濑流湍，勿恃悬崖绝壁。荷君亲之厚德，我不征求；感天地之至仁，尔怀宁抚。苟违诚誓，是昧神祇。垂予子孙，庇尔族类。铁碑可立，可忘贤哲之踪；铜柱堪铭，愿奉祖宗之德。”

南楚的马希范，是个骄奢无度的昏君，但他在处理溪州土家诸部的问题上，还不失为开明的君主。他注意收揽人心，不但以誓约的形式订出法规，而且开仓赈济，使贫苦百姓得到好处。铜柱勒铭，利用了符合当地文化与心理的形式，表明违背誓言便会失去法定的统治地位。这样，后世视铜柱为“神物”，影响深远。当时，铜柱立后，便有许多部落酋豪率众先后归附，南楚声威，达于今川黔境内。